

陈道贵 著

东晋诗歌论稿

第一辑



A0975514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晋诗歌论稿 / 陈道贵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5

(海棠文丛. 第1辑)

ISBN 7 - 5336 - 2964 - 7

. 东... . 陈... . 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东晋时代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9721号

责任编辑: 万直纯

装帧设计: 黄彦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76000

版 次: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

定 价: 11.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2651321

邮 编: 230061

出版者言

“海棠文丛”是一套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丛书分一、二两辑，第一辑为古代文学研究；第二辑为现当代文学研究。

第一辑初收四种：陈道贵博士的《东晋诗歌论稿》、吴怀东博士的《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朱文曙教授、博士的《明代戏曲评点研究》、胡益民教授、博士的《张岱研究》。这四种书都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出版前吸收了评审、答辩老师的意见加以完善提高，并加入博士毕业后一段时间的科研新成果。

第二辑初收五种：王宗发教授的《当代文学观察》、张器友教授的《现当代文学思潮散论》、王达敏教授的《理论与批评一体化》、吴家荣教授的《阿英传论》、张鲁高博士的《先驱者的痛苦——鲁迅精神论析》。这四位教授都出过多种专著，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颇有建树，这次收入丛书的著作是他们新时期以来研究的精华所在。

应该说，收入文丛的九种书都是十分严肃、规范的学术著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有所突破，代表作者本人及当前文学研究的学术新进展。

“一从梅粉褪残妆，才抹新红上海棠。”学术园地百花齐放，梅花报春，海棠斗艳。丛书之所以取名“海棠”，正是寄寓这套丛书是我们学术春天的一抹新红，装点此江山之意。

作为一套丛书，在版式、体例上力争保持统一，但在少数地方，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 研究者的个性，并不强求一致，以免削足适履，在此一并交待。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5月

前 言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进位晋王，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继承晋统者，东晋王朝因此而建立。只是当时偏于关中一隅的晋愍帝尚在世间，故而未正式称帝。翌年三月，愍帝崩，司马睿继帝位，史称晋元帝。自此以至元熙二年（420年）恭帝禅位于刘裕而宋朝建立，东晋共历十一帝，延祚百余年。

本书所谓“东晋诗歌”，与上述历史范畴的东晋概念稍有出入，实以两晋之际的刘琨、郭璞为冠，而殿以晋宋之交的谢灵运。郭璞虽身历两晋，但其主要活动和诗歌创作发生在过江以后，早起檀道鸾、刘勰等人，已明确将其归入江左作家的行列。而牵入刘琨，一方面因其现存诗篇均作于两晋之际，颇能反映东晋建立前后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刘勰、钟嵘等将其与郭璞并提，视为江左诗歌的肇始者，而后世不少论者多沿其说。至于创作实绩多在刘宋建立后的谢灵运被包括在内，则鉴于其在晋宋诗坛玄言山水嬗变历程中所处的特殊位置。王瑶先生论述东晋诗歌流变时，就把谢灵运作为主要对象之一。

这一时期诗歌主潮的演变历程，从南朝檀道鸾、刘勰、钟嵘等人的简要评述中可以一窥大略。但终因他们多语焉未详，加之相关作品所存往往有限，特别是玄言诗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故而难免给人以雾里看花之感。这种情形致使探讨有关问题时，聚讼纷纭的现象屡见不鲜。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可以看出如下两大特征：

其一，对于这一时期诗坛主潮发展演变历程，尚缺乏通贯性的研

见其《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载《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究。像王瑶先生《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那样既注重深究具体问题，又研析诗风流变的成果似不多见。各种文学史、诗歌史之类的著作，在涉及此段诗史时，多惜墨如金，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郭璞、陶渊明等人身上，对东晋玄言诗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则注意不够，往往给人以只重首尾而中间过略的感觉。

其二，与通贯性研究相较，围绕具体作家或专题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一些，主要体现在老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新课题的不断发掘等方面。前者像郭璞《游仙诗》的主旨、玄言诗的起源与发展、陶渊明其人其诗、山水诗起源等问题时有成果发表。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视野的拓宽与方法多样化等特点。比如联系玄学思潮以探讨陶渊明的人生理想与诗歌风貌，从佛教影响的角度探涉有关玄言诗、山水诗问题等。但这类研究尚处起始阶段，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未尝少见，进一步研究的任务仍很迫切。

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本书拟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于尽力把握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脉络，突现其演变轨迹的基础上，广泛联系当时社会现实，努力揭示其嬗变之因。同时，着力研究具体问题，就一些争议颇多的疑难现象提出一己之见。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本书在总体构思与结构安排上，采取了点、线并重的模式。以这一时期诗歌发展主潮为序，串联起若干具有专题性质的章节。务求做到既眉目清晰，又避免浅尝辄止。与此相应，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不苛求行文体例的统一，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选定论题，视问题的症结所在，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决定切入点的选择与用墨多寡。

东晋文人多与包括宗教在内的思想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其中玄学清谈与佛、道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其时诗风的发展演变，与思想文化领域的现状亦存在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果不从当时思想文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东晋诗歌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就难以得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对东晋诗人及其创作的理解，也必定流于肤浅的层面。因此，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入所谓历史文化背景

有关研究现状，见本书相关章节，兹不赘述。

论之列。研究问题的切入点，主要集中在文学与玄学清谈、佛、道等文化现象的关系方面。

由于笔者学识有限，撰写过程中时有力不从心之感，故不当乃至谬误自在难免之数。祈请学界方家、同好不吝赐教，匡我不逮。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两晋之际的时代变奏	(1)
第二章 郭璞与《游仙诗》	(12)
第一节 郭璞政治悲剧探因 [12]	
第二节 《游仙诗》主旨说述评 [18]	
第三节 郭璞《游仙诗·京华游侠窟》诗意 蠡测 [29]	
第三章 玄风独振与玄言诗	(35)
第一节 玄学思潮与魏晋诗坛关系述略 [35]	
第二节 南朝诸家玄言诗论说辨证 [45]	
第三节 东晋玄言诗与佛教 [57]	
第四章 玄风消歇与诗风新变	(74)
第一节 东晋玄谈风尚盛衰之迹 [74]	
第二节 晋末诗风新变论说 [85]	
第五章 陶渊明政治理想与诗歌创作的时 代特征	(96)

- 第一节 陶渊明仕隐观念及其实践 [96]
- 第二节 陶渊明与晋宋之际诗坛主潮之关系 [108]

第六章 玄言山水之变 (118)

- 第一节 慧远与晋末佛教及其影响 [118]
- 第二节 晋宋诗风嬗变之因说举要 [124]
- 第三节 佛教与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嬗变之关系 [132]

第七章 谢灵运与山水诗勃兴 (148)

- 第一节 晋宋易代与谢灵运的悲剧人生 [148]
- 第二节 谢灵运山水诗特质及其所受佛教影响 [154]
- 第三节 余论 [168]

主要参考文献 (171)

后 记 (177)

第一章 两晋之际的时代变奏

以时代而论，刘琨当属西晋，其文学创作也多发生在永嘉、建武之际。但因其被害于东晋建立之后，故以往有不少论者将其视为东晋作家。实际上，刘琨是两晋之际诗坛上的独特人物，难以径直将其归入西晋或是东晋。流传至今日的刘琨之诗，均作于两晋之际北征之时。其所抒发的因苦难时代与个人遭遇所引发的悲愤情怀，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它既不同于西晋“力柔于建安，采缛于正始”的总体诗歌风貌，也有别于东晋“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风。其充满“凄戾之音”的诗篇，可谓两晋之际的时代变奏。我们将其纳入视野，作为东晋诗歌研究的序篇。

一

西晋八王之乱期间，诸王尝利用北方少数民族武力以自援，为日后五胡乱华，中原沦丧埋下了祸根。光熙元年（306），八王之乱虽然结束，但黄河南北广大地区已为匈奴、鲜卑等族所占据。永嘉二年（308），匈奴贵族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国号汉；石勒、王弥等所率部众，与刘渊联盟，活动于河北地区。从此以还，大河南北渐无宁日，而西晋王朝土崩瓦解之日亦屈指可数。

面对如此局势，士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形在王衍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王衍以“神情明秀，风姿详雅”著称，早年便引起山涛、羊祜等人的注意，从而大获时誉，并进而得到晋武帝的关注。王衍崇尚玄虚，善谈《老》、《庄》，加之政治地位高显，遂成为左右

士林风尚的人物。《晋书》本传云：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衍甚重之。惟裴頠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惟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就是这位中朝贵玄之风的代表人物，面临外族入侵的严峻形势，也不得不走出玄虚放旷的藩篱，直接面对现实。“及石勒、王弥寇京师”，大军逼近洛阳时，这位以清谈玄虚不以物务萦心著称的王衍，也不得不委讲从戎。永嘉二年五月，王弥“寇洛阳，司徒王衍帅众御之，弥退走”。永嘉四年十月前后，洛阳被围受困，人心浮动，“朝议多欲迁都以避难，王衍以为不可，卖牛车以安众心”。这些虽未能改变大局，其后又于被俘之时，极力为自己开脱，以为晋室祸败责不在己，并“劝（石）勒称尊号”，颇为后人所诟病。但其中所体现的为时事所迫，不得不转向现实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八王之乱时，王衍之流尚可凭借“宅心玄远”苟得自保；而在外夷内逼，国将不国之际，虽欲坐而论道，行而任诞，却已不复可得。客观形势改变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正是在如此环境中，刘琨同样经历了人生的转折，其诗歌创作也充分体现了时代特征。国难当头、戎马生郊的时势，造就了横槊疆场高歌悲吟的刘琨。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8页。

《晋书》卷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页。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583页。

《晋书》卷四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38页。

二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少年时颇获时誉，“得俊朗之目”，与范阳祖纳俱以雄豪著名。二十六岁时为司隶从事。尝预石崇金谷之会，“文咏颇为当时所许”。又降节事权贵贾谧，与石崇、潘岳、欧阳建、陆机等厕身“二十四友”之列。八王乱中，琨事赵王伦以抵诸王；齐王冏辅政，“以其父兄皆有当世之望，故特宥之”，任其为尚书左丞，转司徒左长史。齐王冏败，范阳王虓镇许昌，引琨为司马。后以功封广武侯，邑二千户。

在这段时期内，刘琨是否有诗歌创作，因无文献可征而难得其详。然以理推之，“文咏为当时所许”的刘琨，在八王之乱前后，亦当有诗歌之作。从预身“二十四友”，到八王之乱前后仕途周折，大致反映了刘琨对世俗功利的积极追求，与以王衍为代表的不以物务萦心、崇尚玄虚自适的精神追求不同。此种人生态度，是西晋时期像陆机、潘岳等一类士人所共同追求的。如果刘琨仅仅到此为止，那么他在文学史上便不会有日后的地位。其早期创作，虽有“文咏颇为当时所许”的时誉，却不见传于后世。其中原委当然是复杂的。但我们似乎可以揣测，其早期创作失传，或是源于其内容风格走的是潘岳、陆机等人的路径，故相形而失色，不被后人重视，因而佚失不存。

刘琨人生的最大转折是永嘉元年（307）出任并州刺史。在赴并州途中，他上表朝廷，深慨胡寇塞路、人民疲弊的惨状。其后，身陷复杂斗争形势，转战北方大地，直至最终被段匹磾所害，报效晋廷之

《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79页。以下引文出此传者不另出注。

刘琨先与段匹磾结盟，共图报效晋廷。《晋书》本传谓琨率众至，“匹磾见之，甚相崇重，与琨结婚，约为兄弟”。刘琨子刘群为匹磾从弟末波所俘。末波与其谋袭匹磾，并遣使“赍群书请琨为内应，而为匹磾逻骑所得”。匹磾因此而拘留刘琨，但并无杀琨之意。后辟闾嵩、王据、韩据等因不满匹磾拘琨，连谋欲袭匹磾。匹磾得知消息，尽诛王据、辟闾嵩及其徒党。“会王敦密使匹磾杀琨，匹磾又惧众反已，遂称有诏收琨”，将刘琨杀害。

志始终未泯。

刘琨思想与行为的前后变化，从大的方面而言是因为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所致。但是，他之所以会在转战沙场的同时，以诗歌的形式抒发慷慨悲愤之情，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自身性格的特点。刘琨早年降节以事贾谧、石崇，为“二十四友”之一，颇染奢侈放浪之习。然而，他性格的主导乃是慷慨入世、努力事功。《晋书》本传对此有极好的概括，谓：

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少负志气”与“恐祖生先吾著鞭”，正反映了他性格中前后一致之处。因此，尽管刘琨在行事上曾与潘岳、陆机等“二十四友”有相近的一面，却于外敌入侵、家国难保之际，其性格中慷慨入世、努力事功的因素，一转而为“志枭逆虏”的豪迈情怀。《晋书·祖逖传》所载祖、刘二人早年相交之事，更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

（祖逖）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而当永嘉前后外夷于北方大地横行之时，刘琨与祖逖的“英气”就体现在抗敌卫国的战斗生涯之中。不幸的是刘琨所处的抗敌环境过于复杂，加之他性格中浮夸因素的影响，其最终结局是悲剧性的。正是这种既满怀抗敌激情，又颇觉其志难伸的矛盾，孕育出刘琨“雅壮而多风”的感人诗篇。

三

刘琨诗今存三首，均为离开洛阳北赴并州后之作，其前期颇得时誉的文咏已不复得见。然而，就是这寥寥数篇作品，却赢得后人的激赏。《文心雕龙·才略》篇云谓“刘琨雅壮而多风”的诗歌风貌，是“遇之于时势”的结果。钟嵘《诗品》则以为：

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

从刘勰、钟嵘的言论中，不难推知他们所针对的大率不出今见《扶风歌》、《答卢谡》、《重赠卢谡》三诗。这三首诗，虽都作于“后期困于逆乱、哀愤两集之时”，但细加推敲，则知五言《扶风歌》比四言《答卢谡》的创作时间略早。后者系刘琨为酬答卢谡《赠刘琨并书》而作。李善《文选》注引王隐《晋书》曰：

刘琨……与卢志亲善。志子谡，琨先辟之，后为从事中郎。段匹磾领幽州牧，谡求为匹磾别驾。谡笺诗与琨，故有此答。

考《晋书》卷五《孝愍帝纪》，刘琨依段匹磾，在建兴四年（316）十二月。同书卷四十四《卢谡传》载谡于建兴末随刘琨投段匹磾，匹磾取谡为别驾。由此可知卢谡与刘琨此次以诗酬答之举，当在卢谡已为段匹磾别驾，而刘琨尚与段匹磾为盟之际，大致就在建兴四年至建武元年（317）这一时段内。

《文选》收刘琨诗三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一收刘琨诗四首，其中《艳歌行》一首难断是否确为刘琨作。下文所引刘琨诗，均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不另出注。

《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文选》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8、1169页。

《重赠卢谌》诗载于《文选》卷二十五。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琨诗托意非常，想张、陈，以激谌。（谌）素无奇略，以常词酬琨。”唐修《晋书》琨本传亦录此诗，且谓琨为段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为五言诗赠其别驾卢谌”。同书卷六《元帝纪》载刘琨遇害在太兴元年（318）五月，而《晋书》本传谓“被拘经月”，故此诗当作于此年四五月间。

《扶风歌》确切作时似无人道及。葛晓音先生谓此诗“抒写他诀别洛阳、眷恋京阙的悲痛，转战荒山、粮尽援绝的困境，以及深恐出征无功，日久不能见谅于朝廷的忧惧”。诗中所抒发的情绪，与《晋书》琨本传所载正相契合：

初，琨之去晋阳也，虑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难以义伏，冀输写至诚，侥幸万一。每见将佐，发言慷慨，悲其道穷，欲率部曲死于贼垒。

由此可见，《扶风歌》作于转战北方之际，具体时间难以考断。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是离开洛阳北上途中所作；而清人何焯疑此诗“为段氏所幽而作”，亦不免臆测。

简言之，刘琨三诗均作于北上抗敌之后。其中《扶风歌》写于转战疆场、胜负交并之次；《答卢谌》作于建兴四年（316）十二月投段匹磾至为其所拘前；《重赠卢谌》则为遇害前不久时所作。

四

刘琨这三首诗，大致反映了他自出任并州刺史而离洛阳以至殒命前夕的生活与思想历程。从中能够体味到面对复杂局势与艰苦环

《文选》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5页。“谌”字据所附考异补。

《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页。

《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27页。

境而引发的种种困惑、忧惧与悲愤情怀，看到大河南北因遭受外夷侵扰而呈现的满目疮痍的悲惨景象。《扶风歌》作于戎马倥偬之际，其涵盖的内容相当丰富：

朝发广莫门，莫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废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文选》李善注谓：“集云：《扶风歌》九首，然以两韵为一首，今此合之，盖误。”《乐府诗集》亦题为九首。陈祚明则云：“乐府，每四句一解，凡九解。”通观全诗，似以分为九解而非九首为是。倘从李善注，则开篇四句不成完整语意单位。故《文选》编者未必误将九首合而为一。

此诗以乐府歌行转章复沓的形式，融广阔时空于瞬间。既随换韵而移转画面，又能做到一气呵成。将抗敌生涯中积累的体验灌注于字里行间，慷慨悲凉之感溢于言表。从中可以窥见曹操《苦寒行》、王粲《七哀诗》的影响。钟嵘《诗品》谓刘琨诗“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陈沆《诗比兴笺》以为其足“与曹公苍茫相敌”，皆属不刊之论。

《答卢谡诗并序》因系酬答之作，故采取了与卢谡诗相同的四言分章体制。答书一气写来，感慨系之，颇为动人。而八章之诗，各具

《文选》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9页。

《乐府诗集》卷八十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79页。

《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二。

《诗比兴笺》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较强的独立性，历述国家民族所呈之惨状，悲悼自己与卢谡家族的不幸遭遇，并为无力回天而觉有负家国。因作此诗时刘琨依于段匹磾，二人亦尝同心而欲效力晋室；且所答对象卢谡昔为自己从事中郎，现在却在段氏幕中，所以在表达与卢谡的情好之意外，还盛赞段氏。此诗虽因四言体而有碍情感的抒发，但仍透露出家国之难激起的悲愤情怀。沈德潜谓此诗尾章“表段之忠信，见谡之托身得所。望其戮力王室，转危为安。收束通篇，感激豪宕”，可见其竭诚事晋之心。

《重赠卢谡》为刘琨自知必死时所作，最能体现“英雄失路，万绪悲凉”之风。其诗云：

握中有玄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讎。中夜抚枕叹，相与数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臧荣绪《晋书》谓“琨诗托意非常，想张、陈，以激谡。（谡）素无奇略，以常词酬琨”。唐修《晋书》本传载刘琨为段氏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为五言诗赠其别驾卢谡”。“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谡。谡素无奇略，以常词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诗赠之，乃谓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此诗前半连用数典，均涉王霸谋略之事，知上引史文所言不谬。而所谓谡“以常词酬琨”，亦可从今存谡诗窥其一二。如《艺文类聚》所录《重赠刘琨诗》，即以谦词酬和琨诗之“握中有玄璧，本自荆山璆”等句：

《古诗源》卷八，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6页。

《古诗源》卷八，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3页。

《文选》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5页。